

The Eye of Villager

主编 章忠云
副主编 曾庆新

村莊視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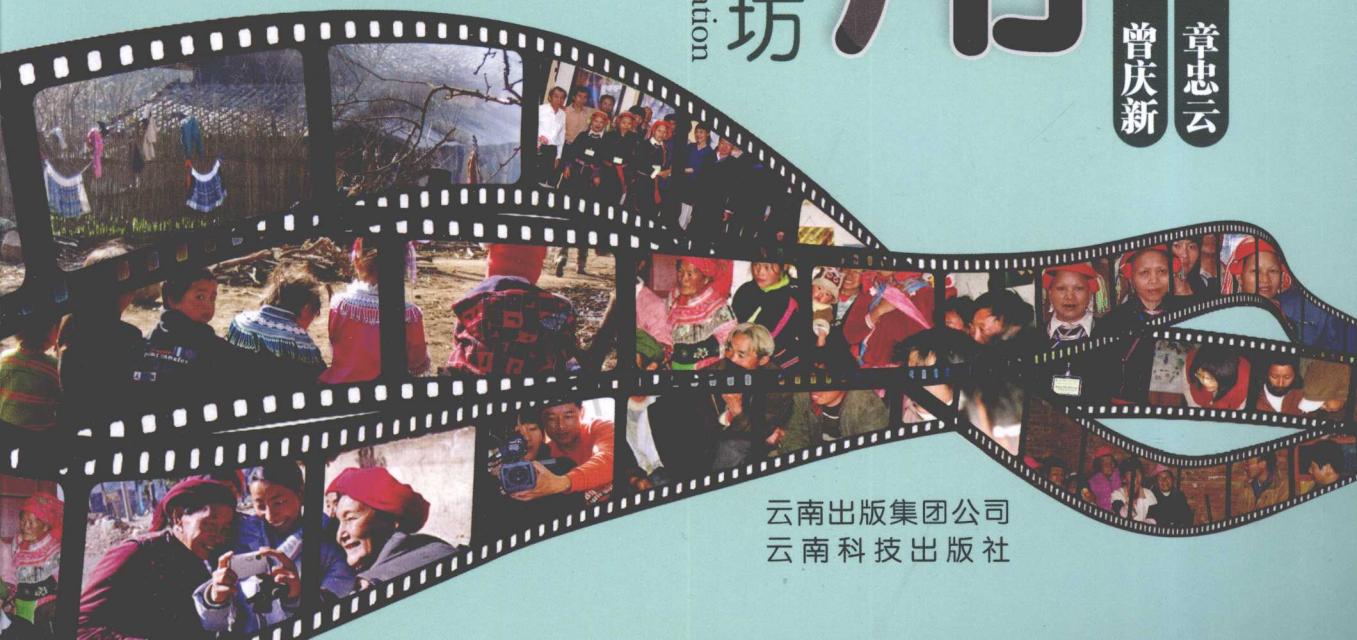
云南·越桂社區影視教育交流坊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雲南·越南社區影視教育交流坊項目
福特基金會資助項目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项目
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

村民视角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

The Eye of Villager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村民视角：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编.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5416 - 3482 - 6

I. 村… II. 云… III. ①电影—艺术教育—国际交流—云南省、越南②电视(艺术)—艺术教育—国际交流—云南省、越南 IV. J90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180 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404 千字

2009 年 11 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定价: 58.00 元

编委会名单

主 编：章忠云

副 主 编：曾庆新

照片摄影：曾庆新 章忠云 Wendy Erd 曹红华 吕 宾

英文翻译：雷著宁 邓云斐 和凤菊 谢春波 章忠云

项目实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

越南民族博物馆

云南德钦县佳碧村

云南省西双版纳勐宋村

云南省文山州烂泥洞村村民

云南省丽江地区宁蒗落水村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厂口乡迤六村委会台磨山村

卷首语

2006年，“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工作坊”项目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后，自2006年6月启动以来，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越南民族博物馆的努力下，在云南和越南实施了三年。作为项目承担者，我们认为实施项目的意义不仅仅是完成项目本身，更重要的是项目实施的过程。因此，把我们是怎样实施项目的、在项目中学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问题、怎样解决问题、获得了什么经验、给项目点带来了什么、给社区影视带来了什么等等情况总结起来，与大家分享，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重要过程和目的。本书希望通过主要记录项目在云南实施的过程，与大家一同分享我们的经验，为社区影视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一个案例。

Fore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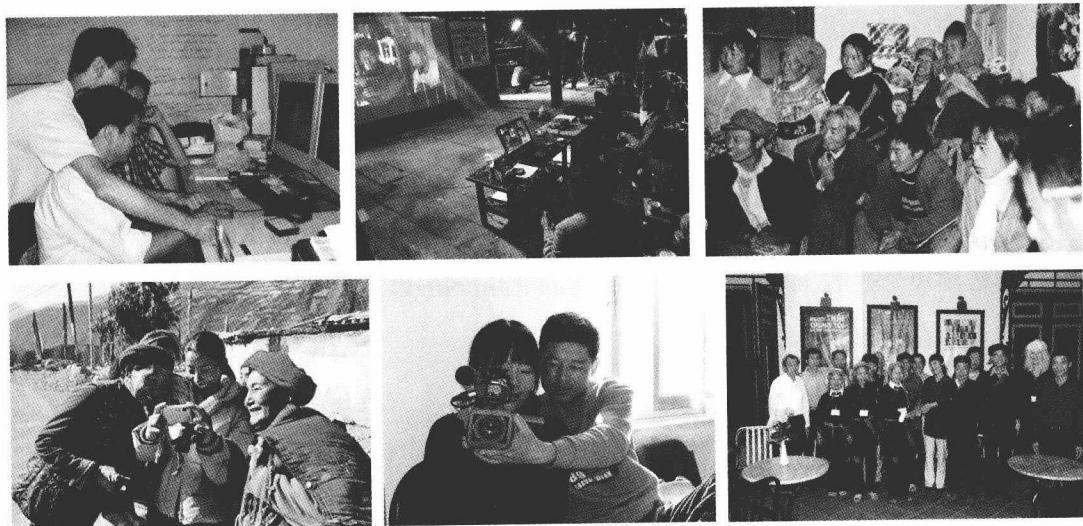
In 2006 , the Yunnan and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ject got the funding from the Ford Foundation. Since it was started in June 2006 , with the efforts from both the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 , it has been put into implementation for three years. As the undertakers of the project , we consider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lie not only in merely completing the project itself but more importantly , in the process of its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 to summarize the situation of our progress , i. e. how we have implemented it , what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project , what problems we have met with , how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s , what experience we have learned , what we have brought to the project sites , and what we have brought to the community - based video , and to share the summarization among us are also an important section of the process of our project. This book attempts to provide and share among us some cas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tudy of the community - based video by recording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ject
Fund Subsidize by Ford Foundation

The Eye of Villager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Editorial Board

Editor in Chief: Zhang Zhongyun

Associate Editor: Zeng Qingxin

Photo By: Zeng Qingxin Zhang Zhongyun Wendy Cao Honghua
Jy Bin

Program Conduction: BAMA Mountain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of YASS.

Jiabi Village Deqin County, Yun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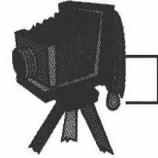
Mengsong Village Xishuangbanna, Yunnan.

Lannidong Village Wenshan Prefecture, Yunnan.

Luoshui Village Lijiang, Yunnan.

Ajigada Taimoshan Village Wuhua District Kunming, Yunnan.

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 论

我为什么拿起摄像机	郭 净 (2)
当前纪录片讨论的几点迷思	井迎瑞 (8)
关于本项目——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项目总报告	章忠云 (15)
火塘边的倾谈——泸沽湖畔落水村摩梭人参与式影像的实践与思考	谢春波 (23)
社区影像的民族实践	赵允智 (33)

第二部分 社区影视教育交流的实践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阶段报告	章忠云 曾庆新 温 迪 (40)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的培训	章忠云 曾庆新 温 迪 (58)
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坊田野工作	
..... 云南项目组各小组成员	章忠云 温 迪 (75)
影像笔记	项目全体成员 (100)

第三部分 社区影视教育交流培训教程

拍拍 剪剪 看看	曾庆新 编 (122)
----------------	-------------

目 录

Part One Introduction

Why I Picked up A Camera	By Guo Jing (1)
About Our Project——Final Report of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ject	By Zhang Zhongyun (8)
A Talk around the Fire: Practice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articipatory Video Education among Mosuo People in Luoshui Village	By Xie Chunbo (18)
National practice of community Based Visual	By Zhao Yunzhi (30)

Part two Put Into Practice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BV) Project Period Reports	By Zhang Zhongyun Zeng Qingxin Wendy (37)
The Trainings of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ject	By Zhang Zhongyun Wendy (61)
Yunnan & Vietnam Community Based Visu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ject Field Work	Team members Zhang Zhongyun Wendy (72)
Impressions and Diary Wrote by CBV Project Participator	Teachers and team members (101)

第一部分

概论

DI YI BU FEN

我为什么拿起摄像机

郭 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5年，“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举办了“社区影像单元”，放映了一些村民和环保工作者拍摄的影像作品，引起观众的兴趣。2007年举办第二届“社区影像单元”，汇聚了更多的作品，有启发的东西更多了。因为在短短的几年间，比较便宜的数码影像产品迅速普及到城乡，拍摄成了一种大众的行为。

在做影像展期间，我们也参与了一些社区影像的普及工作，这些经历，让我目睹了草根影像生长的情形。一个活动，是2006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做的“云南和越南社区影像教育交流工作坊”，另一个是2007年10月，民间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举办的“乡村之眼”纪录片培训。10月10日是乡村之眼活动的第一天。参加项目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藏族。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组织者请他们各自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拿起摄像机的。下面是我随手做的一个记录：



一、仁青桑珠（西藏贡觉县东巴村村民）

1997年，我做生意的弟弟拿了一台模拟的大机器，在我家放了一个夏天。我很好奇，弄懂如何开关，便拍了玩。拍的是生活里的事，过节，祭祀神山，夏天的聚会，动物等等。有时到底拍着没有也不知道。一看，晃来晃去的，头都晕了。弟弟把大机器带走，又拿来一台小的，这回我拍得比较稳了，画面也比以前好看了。现在留下的大录像带家里还有一堆，大家都喜欢看，因为以前拍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有的结婚了。

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觉得是回事儿了，想编辑出来。记得1998年河里发大水，桥和庄稼都被冲了，这些都拍了，但被县里拿去。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是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工作、会议，可从前就是好玩，没啥目的，如今反而太多的概念。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电脑软件编辑，放给村民看。村里VCD多了，过年过节特别喜欢放自己拍的东西，也算是影像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二、旺扎（云南香格里拉县吉沙村村民）

我汉话不好，心里想的讲不出来，简单说说。

那是1998年，村里过春节跳锅庄，我弟弟带了台模拟的大机子拍了一个晚上，然后放给大家看，他忙不过来时我也拍了两下，挺好玩的。但那天电压不稳，又只有一块电池，弟弟把小车的电瓶接出来用，结果把机器烧了。

2002年，我掏钱买了台小DV，请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来开发我们的千湖山，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群众争议很大。我把大家争议的都拍了，不会编辑，就收藏着。还拍了过年烧香，去年的火灾，村民打篮球，想以后会有用。后来刻了光盘给村民，上村的和下村的人看了有意见，都说他们村的事情拍少了。他们喜欢看拍出来的自己，觉得还是看传统跳舞最有意思。



三、噶玛（青海玉树州曲玛莱县措池村村民）

我们村的野牦牛协会做环境保护项目，2005年得了“阿拉善生态奖”，有一万元奖金，我们村就买了一台DV和一个数码相机，开始拍野生动物，在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年做4次动物活动的监测。记得第一次跟踪拍摄，走了4天，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保护国际的陈琦，三江源协会的扎多算导演。陈琦教了我很多，可我没记住几个词，我汉话不好。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所以开会也拍，家家搞卫生也拍。拍了开会时放给村民看，他们很喜欢。

去年参加保护国际的会议，我跟其他拍摄者学了经验。但现在机器被村民看坏了。拍了一堆素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县里乡里的会议，村里的大事，和美国专家穿越保护区，50户村民移民到格尔木。照相呢，用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拍过漂亮的风景、雪山、雄伟的野牦牛。最大的感受，一是给村民看得太多，把摄像机看坏了。二是拍得太多，应该有明确的东西，拿出来给社区看。



四、扎西尼玛（云南省德钦县明永村人，在旅游局工作，诗人）

1998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做“香格里拉”纪实片，在茨中村、红坡村、雨崩村和西当村，以及阿牛的藏文学校拍了4个片子。他们虽然拿着机器，但片子好像是我导演的，真的导演不懂藏话，便觉得我还是个做导演的材料。1999年明永村开发冰川旅游，云南社科院的郭净在村里转来转去拍摄，日本登山队的小林也在拍照片，他拍核桃树，小孩子哭，还有人睡觉。看他们拍，又发现村子在变化，比如马吧，以前有两种用处，做运输工具，男人过节的时候骑。旅游开发后，马就变成驮客人的工具了。那年4月

30 日我们村通了车路，五一黄金周期间虽然下大雨，地上积水，可还是来了大批游人，马背上汗气腾腾，我坐在饭店里招呼客人，没什么事，看人被马驮来驮去，就想用文字记录村民角色转变的感受。

一个搞探险旅行社的朋友来了，带了台 DV，从取景框看是黑白的，放出来才有颜色。我拍了老婆洗头，在电视上放出来，她说真漂亮。我有了想法，就跟郭净说要拍我们村的冰川。1999 年冰川消融得厉害，之前我带几个香港人上冰川，他们看到冰舌处黄灿灿的沙棘树，80 多米高的冰壁，像喷泉一样的冰河，他们很感动。第二年冰川开始化了，现在连最上面的部分也在融化，岩石都露了出来，不知道冰川旅游还搞得了多少个季节，所以，我拍了《冰川》这部影片。



五、阿乐（云南省怒江州迪麻罗村村民，自己做旅游）

1998 年我们村一个老乡从台湾回来，带了台摄像机，那是我第一次见过。亲手摸是 1999 年。CBIK 做项目的吕宾带我们到中甸参观，他带着 DV，我跟他学拍，拍了从怒江到中甸的过程，刻了光盘给村民看，每个星期六都会放给村里人看，还有人不信是我拍的。这以前我拍过照片。台湾带来的摄像机有次到了我手里，正好村里出了不好的事，电力公司砍了我家 20 几棵核桃树，被我拍下来了，我拿去找副县长，他不理我，我心里很难受。我去找电力公司，经理不承认，我说要把片子给媒体曝光。我得知省长要到怒江，便找了林业局长，他看了片子，逼电力公司赔偿我 6 万元。以后我便很想拍。我们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好的坏的事情都多，我要拍了让下一代看。



六、索南更庆（青海玉树称多县赛康寺僧人）

我们寺院有 500 多僧人，我是主任。2000 年拿 DV 拍大喇嘛的活动，拍了拿去西宁做光盘，但拍得像晕车一样，两次都报废了。拍的只有 2004 年的可以看，那是 21 个寺院僧人的辩经法会。

2005 年我们成立了尕朵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朵觉悟是我们的一座神山。我做协会的工作，镜头便对向环境了。我们山下有个冰湖水也干了，那里有传说故事的。以前人们没有看出这个变化，拍出来就看到了。2006 年我们专门拍摄神山的花卉，从开春拍到秋末，拍了 200 多种。还打算拍神山的动物，以后可以看发生的变化。

上面这 6 段藏族与摄像机的故事，让我明白了很多，也联想到很多事情。比如，我原来以为中国早期 DV 运动的参与者都是城里的艺术人士，但有几位藏族就在 1998 年 DV 先锋者刚开始行动的时候（我并非先锋，可也是那时拿 DV 拍摄的），也开始拿偶然碰到手上的机子拍东西了。要知道他们住的地区都非常偏僻，那在靠近内地的农村，DV 拍摄是何时以及怎样开展起来的呢？

在城市里，DV 早期大多被当作艺术的工具，或者当作“纪录片”，说是记录，可

骨子里还是艺术的一种，所谓纪实艺术。许多拍摄者的梦想都是当导演，搞电影。可这些藏族人原来没有艺术的概念，只是拿相机拍村里的活动。其实，活动影像被当成艺术展示是后来的事，当初它的发明者和早期使用者就是拿它拍摄日常的活动，类似于今天家庭录像。藏族们都谈到后来有了构想，整天关心开会和环保，拍摄反而失去原来的乐趣了。那么，除了好玩的初衷，非艺术的记录还有什么价值呢？藏族都提到了“变化”，他们是信仰轮回的民族，所以对生命的改变更替刻骨铭心，原来的小孩子长大了，原来的老人死了，原来洁白的冰川融化了，原来绿色的山秃头了。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把照片叫做“此曾在”，此刻看见曾经存在的，在镜头里看见逝去的生机勃勃。

影像在成为艺术和社会表达的工具之前，本是保存生命记忆的发明。人们因为身处生死循环的中阴当中，要借一切手段，如文字、图画、影像、光盘、移动硬盘、生物芯片保留点转瞬即逝的感觉。其他东西都是在这种企图上一点点附加上去的修饰。所以，我对在农村看到的一种景象特别有感触：某人拍了一段DV，不加剪辑，在家里当场接上电视，放给亲戚朋友看。每个人都看得着迷，为自己刚刚流失的那一部分生活再现于镜中而心醉神驰。

所以，藏族拍摄者们不着急观众的问题，不用在坐着稀稀拉拉几个人，还有人打瞌睡的大厅里闷闷不乐，更不必在观众不提问不鼓掌就离开的时候暗咒他们没眼水。他们的社区放映活动总是热热闹闹，笑声不断。我喜欢专门的纪录片和实验影片，但我的感情更亲近家庭录像，亲近能把我的视觉拉到身边和心里的影像。

这样的拍摄和这样的放映，根本转变了控制影像语言的主体。即使在教育相当普及的现代社会里，影像（电影、电视、摄影等）的掌握和使用依然表现出不平等的一面。谁拍，拍谁，怎么拍，拍了以后如何发表、如何使用，为谁使用，谁是影像的制造者、传播者而谁做接受者，谁是导演谁是观众，谁当老师谁当学生，都有一定的规矩。一方面是外国大片、VCD影碟、电视机以及数码影像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却是信息的单向流通依然如旧。特别是在乡村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成为别人的影像资源，而他们除了被动地观看，很少能利用影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然而，影像在今天如此普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在调查中，我们经常碰到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也拍一拍！”而最让他们兴奋的，也正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的照片和电影。

做项目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早在项目组到来之前，现代的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的社区生活。我们在所有村子都曾看到这样的景象：每户人家的墙上都有一个装满照片的镜框；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户人家的堂屋里看电视。在明永村，拥有电视和VCD放映机的活佛家成为全村人晚上聚会的场所。大家从吃完晚饭，一直看到夜里11~12点，有的人边看边喝酒、聊天，有的甚至当场睡着了。

问题不在于是否把照片和录像引入社区，而在于当地人所接触的影像，大部分来自主流渠道（报纸、杂志、电视台、盗版光碟）。这些玩意儿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让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幻象，它们所包含

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都远远脱离当地民众的传统，甚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诱导年轻人对物质享受盲目崇拜，对暴力和性的宣扬，曲解了经济和旅游开发的意义，以及对藏族的误解等。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民众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从来没有通过影像发表看法的权利。影像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是一种声音。

至于我们这些学者所拍摄的影像，也同样带有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地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更重要的是，很多照片和电影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被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以至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拍摄这些照片给谁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影像应该传达谁的声音，为谁服务？

1991年，福特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个项目启发了一些人开始认真思考影像与参与式教育的相互关系。正如项目发起人王承乐所说：

“纪实摄影的基本原则是：影像可以起教育作用，照片可以影响政策决定，社区和个人有能力创造提倡公共健康政策的图像和文字”。

这个以“photovoice”著名的项目，以其深入的实践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发社区工作者认真考虑把照相机、摄像机交给农民，和他们共同创造为他们服务的影像作品。这个项目和名称（“photovoice”，照片之声）被美国自然保护协会（TNC）继承，于2000年在云南西北部的农村开展，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的结合起来。而我们的小组，也在云南藏族地区开展了名为“社区影视教育”（participatory video education），让村民用摄像机表达心声的活动。

就在我们思考以上问题的时候，以普及数码影像为主流的风潮，也在中国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来。许多人拿起家庭用的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去拍摄以前不为人们关注的边缘人群。由此而来的作品，虽然有的粗糙，有的标榜时尚，但其中最好的那些部分，却对影像的权利提出了疑问，而且明确地主张影像的民间化，致力于个人的影像表达。这对于我们无疑具有启迪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民间，包括了乡村的个人和社区，将影像制作的权力，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力交到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

同时，影像制作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中国政府已制订了推动素质和电化教育的政策，但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内地和中心城市的青少年，也应当包括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他们更需要影像的帮助，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本土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价值观。

非洲的一群先驱者说道：“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Giving people a voice rather than a message）”。这句话贴切地表达了接收和发言之间的区别。这种新的影像制作和传播方式，其主题和对象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结合，同时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影像教育称为

“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learn our own tradition）。

让城市的观众分享来自社区的影像，也帮助影像的多种功能相互对映和交流，可说是我们帮助村民做“社区影像”的初衷。我们更希望把影像带回到城乡的广场和家庭，让记忆回到记忆者的身边。